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12月8日

有所思

只有法治才可真正达到“治”

□张剑锋

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争论，已经持续几千年了。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人治在大多数时期都是占上风的。传统上人们常常认为只要能找到“好人”，人治比法治要更灵活、更有效。人们最尊崇的是那些“青天大老爷”，最提倡的是“为政以德”“半部论语治天下”，最向往的是碰上个好皇帝，再来个“某青天”。而对那些主张“以法治国”的人则很不感冒，或者把他们列入《酷吏列传》，或者编排个“作法自毙”之类的故事来嘲笑他们。

然而，岳飞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遥不可及的理想却一直得不到实现。为什么这么理想的人治始终实现不了呢？因为只有法治才可真正达到“治”。

人治理想的前提靠不住

如果天下的官员都能像包拯、海瑞那样正直清廉、为民做主的话，有什么理由不能通过人治来使天下太平呢？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如果”上。正是这个无法实现的“如果”，使得看似美好的人治始终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要知道，人是复杂多变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大智若愚、大奸似忠，要想准确判断出大量人的能力、品质、性格，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白居易感叹的那样——“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唐玄宗李隆基年轻时英明果决，在平定韦后之乱中显示出了过人的雄才大略，因而他的长兄李成器先将太子之位让给他，继而他的父亲唐睿宗李旦又将皇位让给他。李旦和李成器终其一生，大概对自己的伯乐天赋都感到很满意。他们亲眼看到了李隆基一步步励精图治把大唐王朝送到了开元盛世的辉煌顶峰。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同样是这个李隆基，在晚年变得昏庸无能、刚愎自用，最终招致了安史之乱，使得帝国瞬间坠入了灾难的深渊并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该怎样评价李旦和李成器呢？是他们错了吗？不是。问题在于天宝年间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开元年间的李隆基了。天宝狂澜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人治主义和伯乐救国的结果。

像李隆基这种因为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情况，还算是变得慢的，前后花了几十年。更加让人目不暇接的还是那些因为身份地位和利益诉求变化而导致人发生变化的情况，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陈胜做雇农时，曾经无比诚挚地对一起耕田的伙计们说：“苟富贵，毋相忘。”等到他起义成功称王之后，有位还记得这句话的老伙计来找他了，结果没几天就因为大大咧咧“妄言”“陈王故情”而被陈胜砍了脑袋。这时离大泽乡起义才不过几个月时间。

这里会不会把人治的困难过于夸大了呢？那就看看历史上伯乐救国的真实实践吧。东汉后期是中国历史上伯乐们的一大活跃期，人们品评人物成风，许劭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典型。而且这位许伯乐评的还绝不仅仅是一个曹操，他每个月都要定期发表人才评论，人称“月旦评”。从三国时期开始，这种民间的伯乐救国行为被正式制度化，九品中正制诞生了。朝廷选官就靠各州郡的大中正、中正这些伯乐们的品评。其结果如何呢？时人说得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道德教化不能弥补人治的先天缺陷

看来伯乐是靠不住了，那能不能换一种思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把所有官员的道德品质都提高上去，来实现人治呢？这种德治的思想，从孔子时就开始了。自此以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有哪个政府不主张道德教化的？可是其结果又如何呢？官员队伍的道德素质整体上真的是越来越高吗？虽然没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但就从中国古人对先王时代、西方对古典时代的无限追慕来看，答案似乎并不是肯定的。由此看来尽管道德教化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单靠这个来弥补人治的缺陷也是靠不住的。

更严重的是，人治的问题还有一种自我放大的效应。也就是说，当一个较高的职位被一个不称职、有私心的人占据，而又缺乏对他的制度约束时，那么不仅仅会导致他本人处事不公正，更严重的是他用人也将会出于私心，任人唯亲甚至卖官鬻爵，从而导致更多的官职被腐化分子窃取。这一类似核裂变链式反应的效应会使人治的问题迅速扩大泛滥，形成一个个吏治的重灾区。所谓的塌方式腐败，就与这一效应不无关联。

用法治代替人治

如上所述，我们既无法保证选上好人、能人来当官，又难以有效提高每个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换句话说，就是无法解决人的主观参差不齐这一问题。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办法是有的，那就是以社会的客观来限制人的主观，用法治代替人治。

虽然每个人个体千差万别，难以捉摸，但作为大量个体的集合，一个社会从总体而言毕竟具有对道德正义的看法和行为准则，由于出自大量人的智慧，这种准则一般来说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较多合理性和客观性。将这些准则固化下来成为法制，用以约束人的主观行为，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当然，这些准则中难免会有些不尽合理或是过于机械的地方，但是至少它们可以防止更不合理的情况发生。而且这些不合理之处是公开透明的，也有利于人们去改进或是规避。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谈的法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绝不仅仅限于司法范畴，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人才选拔方面，是推荐还是考试，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让有关部门去自由裁量还是按明确的规则办事等等，说到底都是一个要社会的客观还是要人的主观，也就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问题。

应该说，上面这些道理都不是新鲜事，人类历史上无数先贤哲人早就不知参悟过多少次了。但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却总是被人治思想所统治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既然法治是用社会的客观来限制人的主观，那么自然会影响那个被限制的人的利益，这个人就会跳出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阻挠法治，维护人治。这样的人自古以来一直都不少，以前，他们可以公开打出人治的旗号，而在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他们不太方便这么直说，但却可以用各种各样曲线的方式来阻挠法治，维护自己的人治。这里面相对直白一点的包括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留下某些空白或是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或是搞一堆“内部掌握”的政策。而更隐蔽的则藏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一曰模糊：法规条文既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那样理解，究竟怎样理解才对，只有有关部门说了才算，而有关部门每次说的也不一定一样，要一事一议。其二曰过时：多少年前的老皇历，早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也不废除或修改。遇到了事情，有关部门既可以照章办事，也可以与时俱进，全凭他一张嘴、一颗印把子。其三曰矛盾：政出多门，人人都要管，管法又各自不同，常常互相矛盾，不论你如何办事，总可以有部门跳出来说你做得不对，哪柱香没烧到都不行。其四曰无法操作：十天才能准备好的材料，硬是规定必须五天内交齐。既然你交不齐，违了规，那么有关部门就可以自由裁量了，最后是严格执法还是为群众办实事，就全看你的“沟通工作”做得好不好了……办法有千般万种，目的却是一样，就是让法制这一社会的客观行为准则用不上，而只能去求他这个个人在主观上去大发慈悲。这就是权力。慈悲是可以发的，但显然不能随便发，需要做好“沟通”工作。这就是利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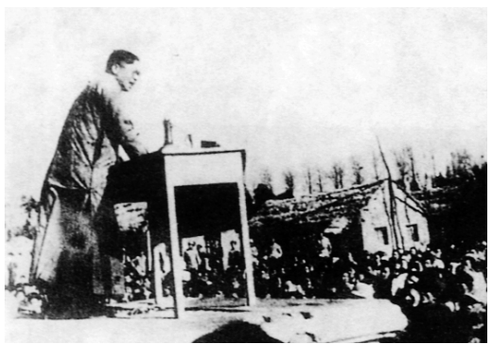
由此看来，时至今日，法治与人治之争，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理论之争，而是利益之争，是被人治的广大人民群众与治人的少数官员之争。我们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自然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依法治国精神，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全面建立来结束这场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争斗。

中华春秋

乱世弦歌：硝烟中的民国大学

□岳　亮

1935年的12月9日，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处在危机四伏漩涡里的北平燃烧起来了。自从八年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平虽然依旧雍容宁静，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显然这一天的严寒没能够阻挡住学生们的热情，在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拟实行华北自治之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五六千名学生走上了街头，愤怒的学生们喊出了“反抗华北自治，抵制日本侵略”的口号。人在上海的鲁迅得知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后，兴奋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然而，严重的局势还是让身陷北平的师生们痛切地感受到，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在演讲

其时，北平已是一座围城，驻在宛平的日军昼夜演习、不断挑衅，战争一触即发。和朱自清一样，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也为北平这一文化重镇的行将沦亡感到悲哀。他建议清华迁往湖南，这一建议得到了校方的采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北平、天津的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空前的浩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占领，私立南开大学则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沦为一片废墟。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在一生的事业化为灰烬时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至1938年8月，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在此民族生死危难时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步入存亡之际。为保留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精髓，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当亡国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国民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后下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北迁陕西，组建西安临时大学。

抗战初期，在内地办学的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战时的大学限于条件无力容纳潮水般涌入的失学爱国青年，而年轻的学生们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保家卫国，教育界也围绕“战时的教育”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有的教授主张在国家危难之际调整教育方案，开设国防课，强化学生的军事训练。但不论是教育部还是各所大学，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反对将课程作较大的变动。西安临大校长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教育部长陈诚也勉励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还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陈诚的口才更具说服力，不仅安抚了学生们的热情，也坚定了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

只是随着战事的升级和政府军的失利，未及喘息片刻的长沙临大和西安临大又不得不继续向大后方迁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后来的西南联大校歌道尽了此中的艰辛与无奈。长沙临大选择了“带着些许法国情调，地处僻远而又宁静的东方城市（陈纳德）”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省主席龙云兴奋地告诉他的孩子，“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他给予了联大师生各种支持。联大师生在刚毅坚卓的精神感召下，宽厚容忍、和衷共济，克服了种种困难弦歌不辍，终于坚持到抗战胜利。而西北联大所处的陕南汉中，虽不是抗日主战场，但国共之间时有摩擦，国民党军对解放区不断围困，同时又距离抗战前线较近，这些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造成师生很难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1939年，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校内进步教授，徐诵明抗命不从，并与北平大学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西北联大遂被解散。

当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简陋的条件下为保留中国的文脉而弦诵不绝时，北平沦陷区的基督教燕京大学和天主教辅仁大学因西方背景成为了孤岛中的绿洲。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表示燕大不会离开北平，不会背叛中国，也不会接受任何一项使燕大毕业生蒙羞的政策。他在燕园升起了星条旗，并以校长名义致函日本驻军，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坚决反对日军入校搜捕进步学生。燕大校友在多年后感叹道：“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但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燕京大学却不得不面临日益恶化的危机。1941年12月，日军封锁燕京大学，拒绝给予完全教学自由，燕大抗争无果被彻底关闭。于是北平硕果仅存独立办学的就只剩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了。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在亚洲所设的唯一一所大学，当华北各大院校因日军攻占北平而风声鹤唳纷纷南迁办学时，辅仁由于德国圣言会的资助关系，仍在刺刀与枪炮声中正常招生。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继续依循中华民国政府学制，保持行政独立，坚守学术自由，不悬伪旗，同时积极扩充学系以延续民族教育。校长陈垣对他的弟子辅仁国文讲师启功说道：“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闭门谢客，率辅仁师生抗敌不屈，学校因此而讲诵如恒，孑然屹立，得以保持一片故都学府的“净土”。中国大学也在校长何其巩的极力周旋下维持至抗战结束。

二十世纪中国史上的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因为战争的摧残而中断。在那战火硝烟的动荡年代，各大学或被占领、或被破坏，甚或泯灭于战火中，学生与教授们忍饥耐寒、颠沛流离，可是民族精神仍然兴旺，士气亦因敌人的炮火而变得更加刚毅。“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昔年冯友兰作词的这首西南联大校歌，其每一个乐章、每一个音符都跃动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民族“新生”的渴望。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与学人，在这一苦难的岁月中坚持弦歌不辍，维系着中华教育与学术的香火不灭，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弦歌中的时代已然远去，但弦歌寄托的理想却将永恒。

毛泽东诤友章士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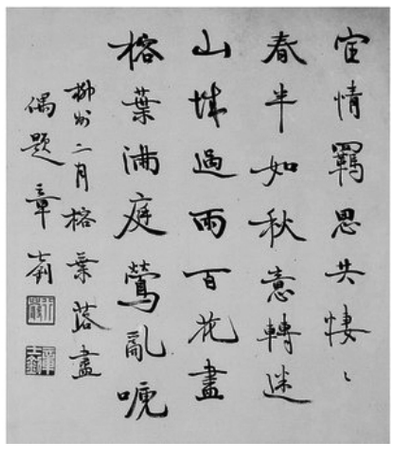
□李秀潭

近日查阅藏书，偶然翻到章士钊签名本《中等国文典》。

《中等国文典》一书，系章士钊助黄兴创立华兴会，密谋刺杀广西巡抚失败流亡日本后，在患胃病住院期间撰写。1907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国语法学形成初始阶段，此书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语法书，对研究语法学有一定裨益。

章士钊，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交游天下，谋道各界，历经民国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各个时期，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都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他早年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南与黄兴等创建“华兴会”，在上海任《苏报》主编，鼓吹革命。辛亥革命爆发，他任同盟会机关报《民主报》主编。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政府秘书长。1916年袁称帝失败，章为国会议员到北京，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推荐李大钊代他任图书馆主任，推举至交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到北大任教。后因杨的关系，毛泽东由湖南到北京，入北大图书馆任职。1920年，章在上海与汪精卫筹建西南大学。时毛泽东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缺乏路费向他求助，他慷慨解囊，资助两万大洋。毛将一部分钱用于赴法留学生旅费，一部分用于回湖南开展革命工作经费。抗战胜利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找章士钊征求对当时局势意见。章士钊凭借他多年的政治洞察力，看穿了蒋介石的用心，密写了“走”字，并轻声告诉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暗示毛速离虎穴重庆，免遭不测。1949年春，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后应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因有这种种渊源，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作为毛泽东的朋友，备受关照，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经常给毛写信反映问题，建言献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身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参与宪法和婚姻法等法规起草，为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的奠定作出贡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他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在繁忙政务之余，他常到琉璃厂等古玩街浏览，收集各种珍贵历史资料。一次章士钊与友人在东四隆福寺逛旧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破旧的《满宫残照记》，内容是记载皇宫生活轶事及皇室、家族来往信札。其中有一封是一位名叫金韫颖的女子从日本寄回国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这位女子文笔出众，很有才华。经他调查，此人是溥仪胞妹，人称“三格格”，现在北京市某街道工作，已是饱经沧桑的普通妇女。章感到其人其事很有代表性，关系到如何做好统战工作的问题。为此，他让金韫颖写份自述，在1955年元旦，亲自呈送毛主席作为“新年贺礼”。毛泽东看到一个满清皇室的格格，经过数十年社会变革的风雨，最终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很感慨。于是批示道：“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提请周总理酌予处理，后金韫颖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国政协一次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引用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希望共产党永远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保持青春活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如此，一个党也是如此。同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革命政府，不能像宋太祖一样，得到天下后就杀功臣。”这些出于对党爱护的肺腑之言，在反右运动中作为“反动言论”遭到批判。根据当时形势，他很有可能被划为“章（伯钧）、罗（隆基）同盟”的大右派。章士钊在家越想越不对头，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立即疾书一信呈送毛主席，详陈自己在会上提意见初衷。毛泽东立即批示政协，说章士钊虽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过激言辞，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章这才得以过关，1958年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厄运也降到章士钊身上。由于历史上他在北洋军阀政府期间，任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三·一八”惨案有关，被鲁迅痛批为“落水狗”，所以北大红卫兵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第二天章士钊将此事告诉毛泽东，毛批示让周总理将他与程潜、李宗仁等人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后来，章士钊看到“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希望毛、刘二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被打倒。章士钊又写一封信给刘少奇，说他不相信外面对刘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刘做些检讨。不久，毛给他回信云：“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但不久，毛又派人把当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章阅读。章看后情绪低沉，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章士钊写信失败后，自知无力制止这场灾难，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著述中，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柳文指要》。章自少年时就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起，他将多年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整理成《柳文指要》。此事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不仅要章将书稿送给他看，还逐字逐句研究，亲自修改若干处。当时康生也将此书稿要去读过，认为章未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其意不主张出版。但毛泽东认为，关于唯物史观问题，“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并写信告章：“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要怕批评。”此书原定1966年初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发生而搁置。1970年章再次提出此书出版问题。当时康生已窃据“文革”高位，专断提出要章将全书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得知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并“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此信送毛后，非但没有招来大祸，反倒促成此书于1971年出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宴会上特向尼克松介绍此书，并赠送他一部作为纪念，后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章士钊上述著作完成后，感觉学术生涯已走到尽头，于是又想到多年从事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尚未完成。他通过女儿章含之向周总理和毛泽东反映：他有志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尽一份力，到香港去走一趟。可惜由于他年迈体衰，对香港气候不适，不幸在香港病逝，终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酌古斟今，国人历来重交友之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章士钊一生在奋斗中彷徨，在彷徨中奋斗，虽然走过曲折复杂的人生之路，但他作为毛泽东的诤友，道义相砥，德业相勉，过失相规，以友辅仁，诚难可贵，值得后人尊敬和效法之。

人物志